

主编 傅璇琮 罗联添

唐代文学

研究论著集成

•第六卷（下）•

三秦出版社

唐代文学 研究论著集成

• 第六卷(下) •

主 编 ■ 傅璇琮 罗联添

副主编 ■ 陈友冰(执行) 戴伟华 李丰楙

论 文 摘 要 大陆部分一九九一——二〇〇〇

本卷主编 ■ 张明非

三 秦 出 版 社

前 言

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从研究的现代意义来说,是从上世纪才开始的。20世纪初,以王国维、梁启超及后继者胡适、鲁迅、闻一多等为代表的一批先驱者,尝试用糅合中西的现代文艺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取代传统的训诂考据及章句之说,将古典文学从经学和史学中剥离出来,初步形成有自己学科畛域和研究方式的一门独立学科——古典文学研究。而在这门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中,唐代文学研究又起着某种标的和示范作用,如胡适在1915年发表的《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琐记》,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的《情圣杜甫》,都是首先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现代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尝试;鲁迅的《唐宋传奇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也都被古典文学研究史视为里程碑式的论著。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似乎是唐代文学研究为最多:据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1〕},1960年到1994年这35年间,台湾各大学研究所古典诗词方面的博士论文共120篇,其中唐五代为31篇,占35%;其中台湾政治大学1980年至1989年的10篇古典诗词方面博士论文,唐代诗词为7篇,占70%。1955年至1994年这40年间,台湾各大学研究所古典诗词硕士论文为681篇,其中唐五代210篇,占31%,这当中还未包括唐人小说、散文、骈赋和敦煌变文之类选题。另外,从1975年至1984年,获“国科会”奖助的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共104篇,其中隋唐文学为37篇,占35%。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已出版的《全国总书目》,1980年至1989

年这 10 年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各个史段的研究专著(不包括选注和鉴赏),除了 1982 和 1985 年,《文心雕龙》的专著略多于唐代文学外,其余各年份以及十年总数,皆以唐代文学研究的专著为最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唐代文学研究是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研究观念变化最大,研究方法较为丰富,研究队伍相当整齐,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的一个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畛域确立过程中最有华采的一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如果以唐代文学研究为学术窗口,通过对其百年来研究历程的寻绎和研究成果的总结,可以更好的整合我们的研究队伍,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使当代学人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从一个新的起点去进一步地开拓和创新。

回顾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科建设,也留下不少遗憾:现代学科的生命力,取决于这样四个要素:学科基础的坚实;学科体系的科学;现实生活的需求;一个既结构稳定又开放交叉的架构。严格地说,如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尚未完成。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上,或是延续了经学、史学的传统方法,或是对西方文艺观和研究方法的搬用而尚未融合,或是借用比较文学、民俗学、地域文化和接受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尚未整合。前面提到的那批先贤,或是由于后来追求目标的转向,或是由于政治立场的纠缠,或是由于学术思想的变迁,他们都没有对自己发现、倡导的新的研究观念作系统的整理和进一步的探讨,仅停留在启蒙这一步,有的甚至从原来的起点上后退。他们的传人或后起者如郑振铎、唐圭璋、夏承焘、陆侃如、冯沅君、刘大杰、严耕望、台静农、郑骞、王梦鸥、潘重规、苏雪林等,有着学贯中西的丰厚积累,又有着创作、研究兼胜的实际体验,本可以凭着自身的优势和站在巨人肩上的优越位置去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体系,但由于外族的入侵和内战的频仍,面对空空的米袋和烽火连天的三月,能在颠沛之中不忘著述,能在难以容忍的境遇之中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坚忍不拔地从事名山事业,使

中国学术一脉孤悬、赖以不坠,已属相当难能可贵,遑论学科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进入 50 年代后,随着不间断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频频的“革命大批判”,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环境乃至生存条件更倍感艰难,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将其推至极至:学术层面的古典文学研究完全停顿,学术园地一片荒芜。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才得到改观。但进入新世纪后,古典文学研究又面临新的困厄和新的挑战。我们现在生存的 21 世纪,是一个高科技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工作、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自身有必要作一番自我审视和反省: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是不是适应这个高科技、信息化的社会?古典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科?已经沿用了一千多年、至今仍在沿用的手工作坊式的研究方式能否应付电脑网络检索系统的挑战?研究者们学富五车的自信与追求会不会因此而被淹没或取代?我们是否承认,社会学、历史学甚至哲学比我们更贴近社会,更能提供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借鉴和措施?对此,我们既不能简单的用古代文学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来逃避参与现实文化创造的责任,当然也不能为了参与、为了得到世人认可就来媚俗,就来急切地展示自己,或盲目地与其它当代学科结合,变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从而失去了自我。为此,中国境内两岸三地一些富于思考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学科,在理论上构建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科,在研究手段和表达方式上如何适应这个高科技、信息化的社会。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窗口的唐代文学研究,通过对其百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回顾,也可以更清楚地看清研究中的缺失;更可以正视现实、端正方向,在应变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完美。

回顾总结近百年来尤其是近 50 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历

程和学术成果,也还基于下面这个考虑:1949年以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两岸开始分治。大陆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唐代文学研究躬逢其盛,在研究成果和研究观念、方法上也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成果,其进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台湾在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投入的加大,唐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大、增多,出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学者和颇有影响的代表之作。1987年解除戒严令和紧随而来的两岸关系解冻,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开始互通和互动。这时大家才发现:由于近50年的阻隔,出于同一血脉、同一文化背景的两岸学者已变得十分陌生,不但不了解对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展情况,而且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也各有异趣。但是中国毕竟只有一个唐朝,只有一个李白和杜甫,出于同一种研究对象,同一个文化传统,在世纪之交又面临着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因此同大于异,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五十年来的阻隔,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形成了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只有通过加强沟通和交流,才能互相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使唐代文学研究拓宽和深化,合力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关于这一点,两岸的学者都有着清醒的认同。1999年秋,我应台北中央研究院之邀,赴台作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为我的那个课题《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搜集台湾部分的学术资料。当时傅璇琮先生正应新竹清华大学之邀在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年底的一个星期天,学海出版社李善馨先生约我们去台北市郊的一个风景区石碇小聚。石碇在台北县的东南,巍峨的皇帝殿拱卫其北,著名的玄奘大学座落其右,是一个自然风景、文化氛围俱佳的游憩之地,台北学术界一些同仁皆喜盘桓其间。善馨先生特意选了个既有山野小店风味又厨艺精致的“福保饭店”让诸位欢聚。当时在座的有傅璇琮夫妇,台湾大学的罗联添先生,东海大学的杨承祖夫妇,交通大学的詹海云先生,成功大学的杨文雄先生,李善馨先生和我。出于学者的习性,闲聊之中也

不离本行。大家历数近百年来学术大家及其成就,仰慕之中也深深为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的困境而叹息,尤其是两岸学者之间的隔阂和对对方学术观点、研究成果的陌生。记得罗联添先生曾举台湾中研院院士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为例,这部积37年心血而成的煌煌巨著,台湾的专业人士几乎无人不晓,但在大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罗先生说这话时,我也不知道是书,以为这是部地理学方面的专著,事后从史语所购了一部,才知道这部书中大量考证皆取自唐代诗文和史料,对研究唐代文学帮助极大。我也提到当时大陆唐代文学研究中争论正激烈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凡我遇到的台湾古典文学学者几乎都问及此事,但对其原委始末、论争要点多不甚了了。基于如此现状,大家觉得可否以唐代文学研究为窗口,两岸学人先做一些沟通交流的具体工作,比如,在目前的课题《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之后,可以再做两岸的《诗经》、《文心雕龙》、明清小说、戏曲等方面研究史,寻绎两岸古代文学研究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历程,通过各自优长的比较,品评其得失,探讨其规律,以期两岸学者对此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在此之前还可以先走一步,将两岸50多年来唐代文学研究中优秀的、富有代表性的论著选编出来,分别写成“提要”和“摘要”,使两岸学人首先了解掌握对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精华所在。2000年5月,编撰人员在合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编写提纲和体例,并于10月在武汉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选目,该项课题正式并快节奏运转起来。2001年11月和2002年10月,两岸的部分编纂人员又在台北的“国科会人文中心”和台湾大学召开两次讨论会,统一体例、了解进度,研讨编撰中出现的问题。两岸众多学者为了一个课题如此频繁的聚会、讨论、交流于两岸,据我所知,也是非常少见的。

上述的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主要动因。由于上个世纪百年当中的后50年是研究观念变化最巨,研究队伍波动

起伏最大,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两岸的疏离也以后 50 多年为巨,因此,我们先着手选编后 50 年。待是书发行广泛听取意见后,再编前 50 年,以期把事情做的更好。《唐代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主要反映近 50 多年来我国两岸三地学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亦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参加选编撰写。其时间断限上限为:大陆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港澳地区随大陆断限),台湾自 1945 年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以来;下限至 2000 年 20 世纪结束。入选对象应是这个时段最富学术含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在这个前提下,尽量考虑到唐代文学的各种研究对象,如诗歌、散文、小说、词曲、作家论、作品论、作家群体研究、流派研究、时段研究、唐诗史、唐诗学、敦煌学等;各种研究手段,如考据、辑补、汇编、编年、年谱、专论、综论、通论、宏观研究以及与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结合的新的研究手段。这套丛书在体例上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论文摘要,共四卷。入选论文由编撰者浓缩为“摘要”形式,每篇 2000 至 3000 字左右,每卷不少于 150 篇;每一位学者的论文在每卷一般不超过三篇,摘要时尽量保持原貌,删节处不加省略号,尽量保持论述的连贯性。第二种为著作提要,亦四卷,“著作提要”以编者的述论为主,指出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每篇 1500 字左右。“著作提要”以其学术价值作为入选条件,不受数量限制。单纯的点校本不收,间有考辨、编年、系年以及补编本则予录;一般的鉴赏辞典之类不收,但像《唐诗大辞典》《唐诗汇评》等大型工具书则予收录;一般的总集、别集选本不收,但有的重要有影响的选本,如余冠英等的《唐诗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等则予收录;综合性的论文集,如《唐诗论文集》《李白研究论文集》等亦收录其中,但单纯的史学、哲学、艺术著作,如《元和姓纂》《唐刺史考》等不收。时段和分类与论文摘要相同。每卷之后分别附这个时段的论文要目和著作目录。全书由两岸三地的唐代文学领军人物,大陆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教授和台湾“中国唐代学会”

前会长罗联添教授任主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友冰研究员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丰楙研究员任副主编并操办具体事宜。两岸三地的17位唐代文学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册的主编,其中第一册(著作提要1949—1980)主编为余恕诚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邓国光教授(澳门大学);第二册(论文摘要1949—1980)主编为陶新民教授(安徽大学)、邓国光教授;第三册(著作提要1981—1990)主编为阎琦教授(西北大学);第四册(论文摘要1981—1990)主编为阎琦教授(西北大学);第五册(著作提要1991—2000)主编为张明非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第六册(论文摘要1991—2000)主编为张明非教授;第七册、第八册分别为台湾部分的著作提要和论文摘要,主编唐人小说部分为王国良教授(东吴大学),唐代散文部分为王基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敦煌文学部分为郑阿财教授(中正大学),唐五代词部分为黄文吉教授(彰化师范大学),唐诗部分为杨文雄教授(成功大学)。全部书稿最后分别由傅璇琮、罗联添两位先生审定。

两岸三地这么多学者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共同承担一套丛书的编撰任务,近百年来还是第一次。这种研究方式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这套丛书也还有种种不完备之处,我们殷切期待着海内外学人的批评指教,以便将下一步的合作和课题做的更好。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从这个课题的孕育诞生到这套丛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两岸三地学人沟通交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同一文化渊源,同一学术归趋的象征。古人云:上善若水。随着港澳的回归,香江、濠水已汇入茫茫九派,唯望海峡两岸亦如隔澎湖、鼓浪,波浪交迭、鸥鸟往还;以至四海一家,天下同心。如此,善莫大焉。

陈友冰

2003年5月于合肥

目 录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刘学锴 (461)
李商隐诗版本考	黄世中 (465)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	
——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	
影响谈起	葛晓音 (470)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阎 琦 (475)
论杜牧诗文的渊源	胡可先 (480)
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	刘尊明 (483)
母题与嬗变: 从《长恨歌》到《杨贵妃》	
——悲剧与宗教的关系	张哲俊 (488)
李诗别笺	安 旗 (492)
杜甫的穷儒意识与诗歌创作	邓魁英 (495)
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	刘维治 (500)
论许浑诗在晚唐的典型意义	罗时进 (504)
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以咸通十	
哲为例	臧 清 (508)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陶文鹏 (512)
长吉诗艺术渊源论	吴企明 (517)
《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说明与评论	
.....	杨 明 (521)
《全唐诗》工作底本探秘	佟培基 (525)

论杜甫的拗体七律	金启华 (529)
论唐人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	
——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历程再回	
顾	李钊平 (531)
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	
——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	钱志熙 (535)
唐代科举诗论略	张浩逊 (540)
陈子昂“兴寄”说新论	徐文茂 (544)
李白仙侠文化人格的美学精神	康 震 (549)
试论南唐中主李璟的词	杨海明 (553)
杜甫诗文中的音乐世界	张志烈 (556)
白居易与日本平安朝汉诗	肖瑞峰 (559)
《长恨歌》接受史研究	
——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	
.....	陈文忠 (564)
中晚唐怀古诗的审美时空	张 晶 (569)
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	傅璇琮 (573)
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	朱易安 (576)
李白屡遭挫折与备受赞誉之两面观	周勋初 (581)
论李白书风	佟培基 (586)
论李商隐与柳仲郢	毛水清 (589)
论唐代小说的创作方法	程国赋 (595)
论佛学对皎然诗学的深刻影响	姜光斗 (599)
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	
——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	葛晓音 (604)
游仙访道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王友胜 (609)

“求奇”与“求味”	
——论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	
代的流变	刘 宁 (611)
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来的唐诗研究 ..	胡 明 (616)
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	
之一	赵昌平 (621)
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	吴在庆 (626)
逸韵流风 踵唐启宋——五代诗歌的艺术	
特征	彭万隆 (630)
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	李 浩 (634)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	李时人 (640)
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	吴言生 (645)
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 ..	杜晓勤 (649)
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	
——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与移位现	
象	余恕诚 (654)
从意象建构看建安与盛唐风骨	张学松 (658)
李白的“相如情结”——李白新探之二 ..	赵昌平 (661)
李白诗中的“自然”意识	詹福瑞 (665)
李杜歌行论	薛天纬 (670)
武则天与初唐文学	傅璇琮 (674)
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	陈铁民 (677)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查屏球 (681)
孤峭人格与荒寒境界	
——论柳宗元山水诗文中的独特禅意	
.....	胡 遂 (685)
主体的自由和现实的困惑	
——晚唐五代词与禅道之关系	成松柳 (688)

论唐诗抒情艺术范式的三大品性	潘百齐 (692)
“道”与“侠”的合流	
——关于李白的人格形态及评价问题	
.....	章继光 (697)
试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新闻传	
播性	沈文凡 (699)
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	
——论柳宗元游记诗文的直接象征性	
和间接表现性	尚永亮 (704)
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傅璇琮 (709)
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	蒋 寅 (712)
杜诗名词缩略语研究	马德富 (716)
大历浙东和湖州文人集团的形成和诗歌创	
作	尹占华 (720)
论晚唐的咏史组诗	莫砺锋 (724)
道士与唐诗	李乃龙 (728)
李白任翰林学士辨	傅璇琮 (733)
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	陈友冰 (737)
附录	
大陆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1991—2000)	
.....	黄高潮 (741)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刘学锴

自钱钟书提出“樊南四六与玉谿诗消息相通”之说以来,学者对商隐“以骈文为诗”这一面续有阐论。本文专谈玉谿诗对樊南文的渗透与影响,即商隐“以诗为骈文”这一面。

一 樊南文中的诗语

骈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精炼含蓄、富于色彩美、音乐美密切相关,但作为诗语,还必须具有诗歌语言的形象性和韵味。樊南文中的诗语,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前代诗文隽语基础上熔铸而成的集合式诗语。如《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中“心惊于急弦劲矢……烟霞绝想”一段,就融化了汉魏六朝一系列清新俊逸、富于形象感和画面美而又诗味隽永的清词丽句。这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以“老大伤悲”的不遇之感为中心,在吸纳原诗语内涵、意味、色调的基础上,经作者妙手点染,产生新的诗味。有时,用一两个典故也能熔铸成情味隽永、形象鲜明的诗语,如《上河东公启》“某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数句。另一种是不用任何典故、藻饰,自出机杼铸成的诗语,大都为抒情写景的句子。或写对前辈知遇的感念,或抒亲故零落的悲痛,或叙羁旅漂泊的苦辛,或状两地相隔的怀想,无不清词丽句,诗味浓郁。可见商隐并非纯

以獭祭取胜，而是同样擅长白描。

二 樊南文中的诗情

作为主情型的诗人，商隐诗“深情绵邈”的本质特点同样体现在樊南文中。樊南文中的诗情，最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怆，对亲朋故旧的感念及哀悼。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到其他人事上。

感伤身世，原是玉谿诗中一个贯串始终、弥漫于各种题材的基本主题。这种沉凝郁积的诗情，在他一系列陈情告哀或感念知己的书启（如《上尚书范阳公谢辟启》、《上李尚书状》、《上河东公启》、《献相国京兆公启》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些启状所投献的对象，与商隐的关系虽有较亲较疏之别，但作者在抒写流离困顿的身世时，都充溢着感伤的诗的情愫。

商隐的祭奠之文，写得最富诗情的是祭奠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恩旧戚属的文章。《奠相国令狐公文》撇开许多具体情事，十年的交契始末，只用“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从公哀歌”十六字概括，一生一死，一始一终，略去中间无数情事，亦包蕴无数情事。这种浓缩虚括的诗笔，最宜于表达浓郁深挚难以用具体情事表达的诗情。从中可以看出，商隐这类吊祭恩知亲戚之文之所以哀恻动人，富于诗情，是和其中融入了身世沦贱之感密切相关的。《祭外舅赠司徒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祭徐氏姊文》、《祭处士房叔父文》、《祭小姪女寄寄文》等祭文，对恩知戚属的感念哀悼和对自身遭际的伤感往往水乳交融。甚至有些代人写作的这类文章，也渗透了自身不幸遭遇形成的人生体验，如《为司徒濮阳公祭忠武都押衙张士隐文》、《为荜阳公祭吕商州文》。商隐胸中郁积的深沉强烈的身世之悲，是其诗文创作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源，也是其骈文诗情的泉源。

三 樊南文中的诗境

这里所说的诗境,是指一篇文章或文中某一相对独立的段落,由诗语、诗情或诗景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具有诗的意蕴的境界。一般习惯于用意境之有无下评诗,而较少以之衡文。但樊南文中一些出色的抒情文是具有诗的境界的。如《为荜阳公与浙东杨大夫启》以如诗似画之笔,行云流水之势,渲染出一片由明丽自然的诗语诗景、萧散自得的诗情诗趣构成的优美诗境。《为荜阳公上宣州裴尚书启》表现上的轻松风趣和内里的不满牢愁形成对照,在相反相成中构成了耐人寻味的诗情诗境。

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比论实之移之评义山抒情文。《祭小姪女寄寄文》便是一篇写真感情而具有优美境界的文章。全篇纯用白描,纯以情胜,在回环往复的抒情中不断将感情推向高潮。“白草”四句,将寄寄幼小的灵魂置身于异乡荒郊古陌的孤单凄凉渲染得十分动人,具有诗的意境和情韵。“自尔殁后”一段,以丽景衬哀情,以姪辈的天真嬉戏反托寄寄精魂不知所之的哀感,同样极具诗情诗境,“堂前”数句,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是骈文。写到最后,不但撤去了幽明的界限,而且撤去了尊卑长幼的界限。全篇所展示的正是由至情至性所构成的诗境,是作者的心灵境界。

四 樊南文的诗心

樊南文中的诗语、诗情、诗境,从根本上说,皆源于商隐特有的“诗心”。这种“诗心”,主要表现为互有关联的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生悲剧特有的关注和深刻体验。商隐骈文中最具抒情色彩和浓郁诗意的,除个别篇章外,几乎都是抒悲写痛、陈情告哀之作。这说明商隐具有异于一般作者的感受人生悲剧的诗心。与此相关,是义山独具的感伤气质与个性。由于悲剧性的身世之感、人生体验深入性灵,致使其感伤情绪已内化为一种气质个性。发而为诗为文,特具一种感伤的诗美。骈文既是典型的美文,又是易犯雕琢伤真、堆砌窒情之病的文体。商隐这类以抒悲见长的骈文却是“绚中有素”,有极可贵的本质与底色,其中蕴含了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验,其感伤气质个性是深入骨髓的而不是浮浅虚矫的。义山诗文的魅力,根本原因在此;他学杜甫,得其神髓者亦在此。

中国古代骈文的发展,与诗歌有密切关系。诗之骈化与骈之诗化差不多是同步进行的。六朝和初唐骈文中,都有颇富诗意的篇章。但统观唐代,诗歌号称极盛,骈文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朝着越来越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很少出现有诗情诗境的名文。直到李商隐,才以其特有的诗心诗才,在一部分骈文中恢复并发展了抒情与诗化的传统。由于商隐骈文的诗化是在经历了唐诗的高度繁荣,包括商隐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诗化程度较前更有所提高,艺术上也更加纯熟。这是李商隐对骈文发展的一种贡献。与此同时,他对骈文多用典、重藻饰的传统形式也作了改造的成功尝试,这就是像《祭小姪女寄寄文》那样,在抒情化、诗化的基础上使骈文语言通俗化。它和魏徵、陆贽的表疏奏议虽同为对骈文的改造,但后者是在突出其实用性基础上的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使骈文更切实用,其结果是使骈文离诗愈远。这和商隐的骈文通俗化尝试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

(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全文约10500字)